

珍妮特·温特森自传中的伦理维度分析

李丹丹

(哈尔滨剑桥学院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69)

【摘要】文学伦理批评自20世纪80年代重获学术界的认可和关注,中国学者聂珍钊于2004年进行了系统阐释,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作者、文学作品以及相关问题。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讲述的是她伦理选择的建构过程,人物的伦理身份、伦理困境、伦理选择都在这本自传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关键词】珍妮特·温特森;自传;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DOI: 10.18686/jyyxx.v3i1.40548

文学作品通过主题和形式建构,用叙事手法展现生活中的伦理价值观。20世纪70年代,英美文学研究者认为人文主义文学伦理学并不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直到80年代末期,人们才发现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伦理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张德旭,2016)。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中描述了家庭矛盾激化、伦理失衡,甚至在感情受伤的打击下曾一度打算用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再到理性回归、自我救赎。作品体现了她冲破伦理的桎梏,摆脱负面情绪,活出自我,做出伦理选择的心路历程。

1 伦理身份的缺失

珍妮特·温特森出生于曼彻斯特,她的生父是一名矿工,生母是一名纺织工。二十一岁的父亲没能承担自己的伦理责任,选择了逃避。母亲十六岁未婚怀孕,十七岁生下她六个星期后,因无力抚养遂将其送入领养机构,同样未能承担自己的伦理责任。父母年龄尚小且不成熟,家庭经济状况和职业也无法保证能够给予新出生的婴儿正常生活上的照顾,于是放弃继续抚养孩子,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伦理身份。珍妮特·温特森从出生就遭遇了父母伦理身份的逃避,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因为进入到新的领养家庭而得到多少改善。从这一刻起,导致她童年时期不快乐的潘多拉魔盒也正式开启。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女性社会地位在选举权、就业问题、家庭与婚姻等方面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在大多数家庭中男性也依然是具有绝对性优势地位的群体。在领养家庭中,养父和养母经营着传统意义上的婚姻,父亲外出工作,从不做饭;母亲从不工作,但却拥有着“话语权”。例如,每周父亲会把工资交给母亲,甚至是在过世前还在安排父亲要做什么。无论是在珍妮特·温特森被惩罚的时候,还是被关在门外和煤库的时候,父亲都没有为她争取过任何权益,所以这个父亲的角色从伦理身份上也是缺失的。由于并没有外出工作,与外界的联系很少,母亲也不希望珍妮特·温特森结交朋友,甚至把她的行为看作是“魔鬼附体”,她并不爱自己的女儿,因此她的母亲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缺失的。父亲不能成为家庭的

“主心骨”,没有树立父亲的地位和威严,没有承担父亲在养育子女时应有的责任,是一位失败的父亲。亲生母亲的抛弃、领养家庭母亲爱的缺失,以及养父的胆小怯懦,温特森找不到爱的归属。无论是未婚先孕的母亲,还是领养家庭父母之间的“冷漠”,使得温特森的成长从未伴随着所谓“正常的”家庭伦理关系。

2 伦理困境的影响

伦理环境也是珍妮特·温特森性格塑造的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妇女开始寻求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战后妇女的就业机会增加,对丈夫的依赖有所减轻。妇女地位的提升、家庭生活和经济地位的改变,也让珍妮特·温特森的女性主义意识开始觉醒,同时也是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过程。

英国在工业化革命后,很多城市留下了工业化的“痕迹”,工人阶级生活处于艰难挣扎的边缘。珍妮特·温特森从小生活在非常压抑的环境当中,父母没有给予她足够的爱。终日食不果腹,常常寂寞绝望,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就像个矛盾体,渴望爱和友情,又害怕失去,会胆怯逃离。家的概念对她来说是昏暗的,从家中室外简单的装饰到室内的陈设,一方面讽刺了温特森太太的偏激;另一方面也反衬了自己生活的艰难。即便如此,她将自己比喻成地图,而生活有无限种目的地和可能,随时可以打点行囊准备上路。这说明在珍妮特·温特森的心中还是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内心即便遭受爱的缺失,但是仍然能够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由于小的时候经常被锁在门外,门阶对于珍妮特·温特森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跨越门槛就意味着从一个人的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人的世界。在奈丽阿姨的阳光角落和善良让她学到了爱的第一课,她没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爱,却在一个陌生人身上学会了爱。也正因为如此,曾经她觉得爱不可靠,也不能够持续,这样的观点也影响到了她后来的感情生活。她认为养母虽然在家庭中掌握着权力,但是她没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庭”,而家庭是两条线的交点,是心灵和情感汇聚的地方,家是秩序井然的地方,而这些珍妮特·温特森在这个家里没有感受到。对于她而言,这

一个家既没有秩序也没有安全。自从16岁离家之后,她不断地迁居,她没有安全感,任何地方对她来说,都没有家的感觉,直到后来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适应与另一个人共同生活。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家庭环境都没能给予她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而书籍为她打开了另一扇窗。通过阅读书籍,她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把一些荒诞且负面的内容用幽默诙谐的表达方式写出来。即使她显得非常的格格不入,但是她并不会非常极端,她会通过读过的故事与自己的人生进行联想,带着读者的思绪走向积极的一面。

3 珍妮特·温特森的伦理选择

从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能够看到,她在经历这许多后也并没有放弃生活下去的勇气。在她的作品《守望灯塔》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都是幸运的,即使是最不幸的人也是幸运的,因为天总是会亮的。”她用多部文学作品当中主人公的经历来展现自己从小所经历的折磨和伤痛,用间接的方式表达曾经的煎熬与痛苦。她的生活充斥着压抑,书籍承载了她心灵上的负荷,逐渐帮助她走出阴霾,最终获得成功。通过阅读书籍、诵读诗歌、撰写小说等,她获得了灵魂的救赎。

她对家庭生活没有抱有期望,甚至连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也并不是特别地了解,也从不知道对自己父母可以有喜欢,也不知道父母可以爱孩子爱到什么程度,因为在她印象中的父母对孩子只有伤害。她把养母温特森太太比喻成黑洞,这个黑洞把所有的光芒全部吸进去,把她的生活变得黯淡无光。但即便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她仍然发现了人能够通过被爱与爱别人得到治愈。十六岁的珍妮特·温特森离家出走,也让她从此远离了养母这条抑郁的黑暗轨道。在她的小说《给樱桃以性别》中,她创造了一个叫做“犬妇”的人物,这是对养母的再一次诠释。她认为对自己的母亲付出了爱,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当她发觉自己身世秘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温特森太太一直想领养的是一个男孩,所以会给她穿男装;养母时常挂在嘴边的话“魔鬼领我们找错了婴儿床”,以及“别问丧钟为谁而鸣”;即使是养母去世之后,她看到自己的领养文件,涉及到自己名字的地方都被粗暴的划掉了……这种种的表现都说明养母从未给予她爱。家庭中亲情的缺失,对珍妮特·温特森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甚至将她逼迫至崩溃的边缘。

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展现了家庭伦理中父母对子女爱的缺失,在现代社会仍然在上演着重复的故事。近期,一则标题为“现实版樊胜美”的新闻冲上了热搜,一位

24岁的女生遭遇了不幸,其原生家庭在女儿出现意外遇难后屡次要求公司增加索赔数额,却是为了给儿子买房付首付。而女生生前的微博显示长期遭受家人贪婪的索取,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无论是新闻中的女孩还是珍妮特·温特森,家庭没有成为心灵栖息的港湾,反而成为了冰冷的牢笼。阅读书籍帮助珍妮特·温特森能够看清、想清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读书同样也教会了她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解,包括对温特森太太的看法和态度。书可以给她光明与温暖,即使她最喜欢的书被养母用煤油倒在树上烧了,看着熊熊燃烧的书籍,她也感受到了温暖与光明,从侧面更加反衬出这个家庭的冷漠与无情。在极度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珍妮特·温特森认为外在的任何东西随时都可能被夺走,她认为只有内心的东西才是安全的,而藏在内心的正是书籍赋予她的知识、眼界和格局。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下故事,文学就是她的救命绳。文学一次次的将她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一次次的对她进行救赎。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她通过书籍来安抚自己的情绪,使得她更清晰地了解内心真实的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我要快乐,不必正常”的明确回答。这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在表达逆流而上的勇气。活出自我,勇于面对家庭伦理的困境,迎难而上,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的人生我做主!这是珍妮特·温特森做出的伦理选择。

4 结语

在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中多次提到养母喜欢收集的皇家阿尔伯特瓷器、抽屉里的左轮手枪、图书馆书籍作者A到Z,以及提及多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情节,都暗示出在养父母畸形的家庭伦理环境中文学对她人生观的重塑作用。她始终在缺乏爱的环境中长大,书籍充盈了她的内心世界。她把诗比作是一根绳子,把书比作一条条救生筏,帮她平稳度过生活上和心理上的惊涛骇浪。通过分析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揭示了缺少爱的家庭环境中伦理身份认知和艰难建构的过程,期望通过本文能够引起对家庭伦理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作者简介: 李丹丹(1983—),副教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英语教育,商务英语。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2019年度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珍妮特·温特森创作中的伦理维度探究》(项目编号:WY2019003-A)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 [2] 苗学华,珍妮特·温特森及其小说中的家庭伦理选择[J].北方论丛,2020(6):89-95.
- [3] 张德旭,西方文学伦理学批评:脉络与方法[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09-214.
- [4] 珍妮特·温特森.冯倩珠,译.我要快乐,不必正常[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